

蒋梦麟

乾明
恩立志

桑吴
凤小
平龙
|| 编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蒋梦麟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 明立志 ● 吴小龙
● 乾 恩 ● 桑凤平

||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蒋梦麟著;明立志,吴小龙,乾恩等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ISBN 7-5006-4064-1

I. 蒋... I. ①蒋... ②明... ③吴... ④乾... III.
①蒋梦麟—文集②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590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4018359 发行部电话:(010)64010813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22印张 2插页 485千字

2001年5月北京第1版 200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1.00元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64033570

总序

王岳川

百年中国，沧桑巨变。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整套价值话语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话语系统，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具有不可忽略的思想价值功能。然而，在“现代性中国”的历史境遇中，却因时代精神的迁移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嬗变，而面临话语失效的问题；西方

基督神学的话语系统,尽管可以同中国思想形成世纪性对话,却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很难再具有群体精神信仰的功效。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东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去创造新的价值体系,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逐渐减轻以至于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是开窗敞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莱、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是全盘接受而搞非历史的横向移植——全盘西化(极端的激进主义)呢?还是部分接纳——半盘西化(温和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即只接受古希腊的民主、科学精神,不要希伯莱的宗教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只接纳近代启蒙理性精

WAD36/06

神,不接受反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精神呢?是拒斥西方文化的渗入,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承认中国文化可以借鉴西方走创造性转型之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不仅讲求形而下,关注事实世界领域,而且讲求形而上,关注价值世界问题呢?甚或,像当代某些后现代文化批评家那样,只要所谓“新”的反理性、反启蒙、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不要现代性或民主、科学、真理、启蒙、公正,而走向经济消费主义和生命玩世主义(当代虚无主义)呢?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生存意义的迷失、价值的失落,是终极关怀和生命理想层面的问题。

就学术文化史而言,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的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而且,在世纪末,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东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

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时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方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今天,在中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进程中,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寻绎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不是要使真理、正义、理性、启蒙让位于语言游戏和价值虚无,而是秉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对风云变幻的“后冷战”国际舞台,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智慧与精神,用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性的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胸襟和生活价值观,来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只有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文化无国界。东方深厚的文化精神无疑对人类的明天仍有滋养作用。华夏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藉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

文化的和谐清新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可能性。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他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去照澈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回首二十世纪,一代代学者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为世纪立言,为中国文化立心。学者们殚思竭虑,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去审视,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对比;或关注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对中国原典进行现代阐释;或注意中国文化中的学统、道统、政统关系,期望在道德理想主义中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关注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致力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汇合;或身处“政治与学术之间”,从事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学术研究;或以高人逸士的风范,吞吐中西的胸襟洞察心性灵魂而独出机杼写出诗性感悟;或独标“散步哲学”,在“流云”般的自由思想中寻求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哲人们以本真生命为底色,以人类面临的世纪灾难为基点,为这千纪年的世纪末转换发出新世纪的“天问”——问向天人之际,问向古今之变,问向灵肉之间。

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术大师和优秀的学者以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

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在文化转型中的价值稗史时代，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申说着华夏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沉重的“未来千年备忘录”。

编选这套百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旨在立足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审视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历程，并进而展望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景。“大系”分为两个系列：“系列一”主要选编业已去世的现代思想学术大师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示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的体验、理解、反思；“系列二”选编当代著名学者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现当代学者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反思、研究、探索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大系”分五辑（每辑二十卷），五年内出齐。严谨的思想体系、求实的学术品格、素朴的编辑作风是我们编选这套大型丛书的追求。

需要说明的是，在组稿中，我们根据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广泛地约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撰稿，得到诸多学者的热情回应。然而，由于版权等多方面原因，有些应该入选的学者仍未能收入本丛书，使我们深感遗憾。但我们将尽力而为，以使这套丛书能完整地展现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风貌。另外，为保持原作风格及其时代感，作品的行文造句、用词用字基本保持原貌。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观念，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有其处世时代的思想烙印。相信今天的读者会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重读”、“重释”这些作品的意义。

愿这套丛书在寻求心灵对话的途中与你相遇。

是所望焉，谨序。



序

耿云志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朋友，出版一套《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的丛书，其中有《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一册，潘平同志坚请为作小序。几年前，该社曾有刊行蒋著《西潮》一书的计划，当时亦应潘君之请，为作一序。但事有凑巧，当该书即将印行之际，别家出版社已捷足先登，书已面世。我的那篇序未能派上用场，后来收入拙著《蓼草集》中。如今再为蒋氏之书写序，自当避免重复。兹仅就蒋氏生平、教育思想、文化观念几个方面，就前序所未及者略补叙之。

—

蒋梦麟(1885—1964)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学者。浙江余姚人。浙江自古人文发达，南宋以后更加显著，清末民初，这里人才辈出，全国称盛。而蒋氏于众多浙江知识

分子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名人。蒋梦麟，原名梦熊，后因参加学潮获罪，避地改名梦麟。旧时学者沿古人文字通假、同音互用之习，又常写作梦邻，朋辈即以作为他的号来用。

蒋氏生于浙江钱塘江口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的中产家庭，幼读私塾，植下传统教育的根底，曾考取秀才。1908年，负笈西行，到美国留学，至1917年学成归国。九年的留学生活，有比较充分的机会直接观摩、体验西方文化，使他成为那时期能够融汇中西文化的极少数中国人之一。

归国后，蒋氏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界服务。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受蔡元培之托，代长北大校务。以后，曾数次代理校务。1928年—1930年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12月，正式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至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合设西南联合大学于昆明，蒋氏仍为负责人。直至1945年，始辞去教育行政职务，到国民政府中任职。蒋氏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委员及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主任委员等职。总其一生，六十岁以前，精力最盛时期，皆在教育界服务，六十岁以后始入政界。在教育界期间内，除掌理教育行政之外，尚有余暇从事教学与写作，亦可算是一位学者。而其服务政界期间，绝大部分是担任治事之职，与专治政事之官僚亦有所不同。在中国政治史里，历代官僚体系内，皆有治政、治事之分，治政者重于权，治事者重于责。两种人物在政体内部地位不同，作用不同，其心态、作风亦往往不同。论列中国人物，此点不可不注意。

蒋氏从政之后，所担任的最主要的职务是农复会的主任委员。农复会的主要工作是农村土地改革，在大陆时

期已着手此项工作，但在战乱环境下，此项工作自不易开展，到台湾后始逐步取得成功。

蒋氏一生，用力最多的是教育行政和农村改革，而教育事业和农村改革事业，实是现代化过程中两项最基础性的事业。在这两方面，蒋氏确实做出了贡献。

二

蒋氏在美留学主修教育学，是著名哲学家兼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归国后长期服务教育界，所以，我们首先谈谈他的教育思想。

蒋氏投身教育界，正当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人的解放运动。所谓人的解放，首先是个性的解放，其表现于教育界就是个性主义的教育。在谈到“为什么要教育”这个问题时，蒋氏说：“教育在使个人发展本能，使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并且同时培养他，使有改良环境的能力。”首先要使个性、个人能力得到发展，从而使其具备改善环境的能力。于是，个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目标便统一起来。蒋氏又说：“个人之天性愈发展，则其价值愈高。一社会之中，各个人之价值愈高，则文明之进步愈速。吾人若视教育为增进文化之方法，则当自尊重个人始。”蒋氏还对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做出解释。他说：“何谓个性主义 (Individuality)? 曰，以个人因有之特性而发展之，是为近世教育学家所公认，教育根本方法之一也，无或持异议者矣。”又说：“何谓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曰，使个人享自由平等之机会，而不为政府社会家庭所抑制是也。”讲个性主义、个人主义，一向是专制主义视为大忌者。古代统治者自命代天牧民，视民为群羊，“仁者牧

之，不仁者肉之，牧之始，肉之兆也。故牧民政策之下，个人无位置，尽群羊而已。”所以，个性主义的教育是直接为民主政治培育基础的工作。

蒋氏认为，个性主义的教育，应培养出具备“活泼泼的精神的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生产的个人”。“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专制主义者总是把个人主义诬之为“自私自利”，从而汨没之，铲除之，使人人服服帖帖，做专制主义者的工具。新教育强调发展青年的个性，正是为求造就主动精神，有能力改良社会的人，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发达，谋全体人民的福祉。

为贯彻个性主义的教育，为培养有能力改良社会的个人，蒋梦麟等新教育家，针对五四时期学生运动高涨的情形，对青年学生提出希望，要他们从三个方面注意训练自己，提高自己：一是学问方面；二是团体活动方面；三是服务社会方面。在团体生活方面，他们特别希望学生学会民主自治的方法，养成容纳反对意见的精神和肯负责任的精神。这是把个性主义与民主主义直接联系起来，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直接联系起来，这是蒋氏那一代新教育家们最为关注的一点。

三

这本书收入蒋氏谈论文化问题的言论很多。近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们，谈起文化问题，都不能回避中西文化的关系。前面说到，蒋氏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又在美国留学九年，对西方文化也有较深的体验。他对中西文化的观察和所取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注意。

蒋氏认为，中西文化从根本上说，都包含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天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解决这三个关系问题，产生文化上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三者是中西都有的。但发展起来产生不同的偏向。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尊重自然的法则，认为人应该顺从自然的法则，人伦秩序应当自然和谐。他们不是把自然作为对象去研究，而是效法自然的秩序，重视人伦关系的和谐。至于人与物的关系，儒家讲格物致知，其目的却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而下者，亦不过求物之可应用。西方人的自然主义，把自然作为对象，其格物主要目的在于穷究自然之理。所以，“西洋的格物，是识物之性，中国的格物，是求物之用。”蒋氏特别提出，西方人的人伦道德，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来，是从超自然的宗教得来。于是中国人的理性主义的功夫主要都用在人伦道德上，西方人的理性主义功夫主要发挥到格物穷理，研究自然。“希腊人之讲理则，偏重于知，逻辑即求知之方。中国人之讲理则，偏重于行，人伦行为之常轨。”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由于这一点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氛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蒋氏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蒋氏也注意到“儒家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人与己之平衡为基础，不偏重于己（个体），亦不偏重于人（集体）。但希腊人则以个体为重，以个人之智力美感与体力积极的发展为人生最高目的。”一个重整体的和谐，一个重个体的发展，这同样是一个造成东西文化不同的主要原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蒋氏提出，儒家重人己平衡，是既不偏重于个体主义，也不偏重于集体主义。长期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不重视个体而强调集体，反对个人主

义，提倡集体主义。我一直不赞成这种不假深思，主观推断的说法。把个人和集体看成是对立的两极，是不对的。须知，集体是个体的联合，没有个体，哪来的集体？中国人通常所说的集体，其实是整体，一个家庭是一个整体，一个宗族是一个整体，一个机构是一个整体，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如此等等。这些都不能笼统地说成是集体。所谓集体，是个体的联合，联合起来的各个个体，形成其公共意志，这个公共意志才是集体主义。我认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只有正确理解个人主义，完全清除把个人主义曲解为自私自利的偏见，才有可能。

尽管中西文化有很大的不同点，但蒋氏认为，人类的文化本质上是相同的。首先，道德理想是相通的，对知识的态度是相通的。蒋氏说：“中国固有道德之极则为忠恕两字。中国之忠与恕，和西洋之忠与恕，可以说是神似的。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行之有效的。这是作者亲身体会过的。各国的真正士君子，莫不如此的”。接着，蒋氏又征引孔子的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等。蒋氏说，“各国的真正学者莫不如此”。

蒋氏还指出，中西文化，表现于治国理想上也是神似或相通的。例如孔子所说：“足食足矣，民信之矣”。管子所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节”。各国的经济、社会、安全政策无不以此为目标。再有，孟子的“民贵君轻”，与民治主义亦神似。（这一点，清末民初不少知识分子皆有类似看法，实则是不大正确的——笔者。）各民族的文化既然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历来各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单一的，直线发展的，而是多元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蒋氏认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已吸收了许许多多外来

的文化,从衣食到娱乐,都是如此。中国古代哲人盛倡“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而发育出豁达包容的伟大精神,这是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他有一个颇与流俗迥异的见解,即认为,“从大处着眼,儒家学说实能适合近世之人文主义(以文化发展人类之幸福)与自由主义(宏量包容)。西欧近世文化之输入中国,儒家学说实为迎宾馆之主人,任殷勤招待之责。”这一点很可进一步加以研究。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蒋氏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即是他所说:“凡愈懂中国文化者,愈能懂西洋文化;愈懂西洋文化者,也愈能懂中国文化。”正因此,他在一定意义上,赞成“保存国粹”。他并且说:“我们决不可忘记中国卓越的道德体系,这个旧体系是经过千百年长期的经验和历代不断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这个道德体系曾使中国人诚实可靠,使中国社会安定平静,并使中国文化历久不衰。道德观念如忠、孝、仁、义、诚、信、中庸、谦冲、诚实等等,都曾对中国人的心情个性有过重大的贡献。现代科学所导致的知识上的忠实态度自将使几千年来道德教训所产生的这些美德更为发扬光大。”

我以为,读者如能以平心的诚实的态度去细细体味蒋氏有关文化问题的这些言论,必可引发好学深思,明敏向上的精神。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第三辑

学术顾问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桂生	任继愈	汤一介	李泽厚
李学勤	周一良	金开诚	庞朴
张岱年	季羡林	费孝通	赵朴初
钟敬文	钱中文	袁行霈	蒋孔阳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编 王岳川

副主编 蔡乐苏 李凌己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岳川	王宪明	王斌俊	王 瑞
严 平	陈 来	陈浩增	李向晨
李硕儒	李凌己	汪 宇	张 勇
张志扬	张国风	张晓霞	郑一奇
贺照田	胡守文	欧阳哲生	陶东风
程绍沛	董士伟	蔡乐苏	潘 平